

董必武的绿化诗情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董必武非常关心和重视绿化工作，大力提倡植树造林。他通过创作一首首植树造林的诗词，把绿色的种子播撒在人们的心田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为植树造林分担一些“补洞洞”“敲边鼓”“跑龙套”的工作，使更多的人参与到绿化祖国的伟大事业中来。 □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1964年1月，79岁的董必武在湖北考察，这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林业，思考林业发展问题。他在湖北省林业座谈会上谈了两个建议，全部用诗歌的形式写出来，通俗易懂，引人入胜。1月8日，他写了《农村要大办林业》一诗，全诗32行，对农村植树提出了完整的建议，特别是开创性地提到了林权问题，鼓

励确定林权，坚持“谁种谁有”，农民个人种植的树木归个人所有的政策，以提高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。今天看来，这些观点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性。他在诗中写道：

林权照规定，为私也为公。社队订公约，护林责任崇。见缝即插针，不让地有空。……

为期三十年，满眼青葱。树木皆成材，资利用无穷。

1月14日，董必武作了《铁路公路旁植树》诗一首，全诗56行、分5个部分，以诗代论，阐述了道路绿化利国利民的重要意义：

铁路公路旁，植树有潜力，……

路树美风景，宜有不宜无。若从经济论，路须与树俱。……

路里五十万，几亿本非虚。如栽速生林，十年成材储。……检查路政时，莫将树忘记。每年有收益，亦须入会计，……

期以三五年，沿路有林带。员工同认识，蔚成新风气。

诗写好后除提交会议代表外，还抄给中南局书记陶铸、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、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、广东省委书记、副省长林李明及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邓子恢。

1964年2月，董必武又来到广东省视察，在湛江海滨公园栽下白玉兰后，又来到海南视察。2月7日，他写了《椰林》诗：

海畔椰林一片青，叶高撑盖总亭亭。年年抵住台风袭，千伟花繁子馨馨。

他以满腔热情赞美了海南椰子林的壮美和作用。2月8日写了《椰庄海边黎民村》：

椰子林中住，幽村乐气清。日升明向午，潮落静无声。

蚌蛤寻非远，鸡豚散不争。

社员理生事，集体业心萦。

通过视察途中的所见所闻，歌颂海南农村的新气象。同一日，他还作《鹿回头椰庄招待所》诗：

海闻龙摆尾，山见鹿回头。

椰树森林立，渔舟渺渺浮。

1965年1月，当董必武得知沈秘书的战友、曾为新四军第五师干部的张广图在北京林学院任副院长时，非常高兴，当即挥毫抄录曾在海南作的《椰林》诗赠送给张广图，以示鼓励。同年11月12日，又创作七言绝句《植树诗——为北京林学院补壁》二首，其一曰：

秃岭荒山须覆盖，海滨河坝要经营。环村尽有空闲地，树木栽培志士争。

其二曰：

利在将来常被忽，效生左近会当寻。君如岁植十株树，廿载将成一片林。

诗意深远，字迹遒劲，阐述了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，号召植树造林，表达了对林业工作的关怀。张广图接到董必武的诗后，立即送到荣宝斋裱糊，然后特制了一个米黄色木质框，把它挂在会议室里，作为座右铭。

伟人已去，风范犹存。如今的祖国大地已是绿树葱茏，山清水秀。董必武倘若有知，也会欣然九泉了。

林散之的“三痴”

林散之从小痴情于诗、书、画，取号“三痴生”，终生未曾辍止。

林散之无时无地不在推敲诗作。病卧时、睡梦中、吃饭时、走路时，常不能自控地兴起作诗。甚至在坐马桶时也沉思，觅得佳句急起身提裤去桌上取纸笔记下，以免遗忘，一时传为笑谈。林散之一生写诗2000多首，他自认为诗、书、画中，在诗词上耗费的心血最多，诗应排在第一位，赵朴初更是赞曰其诗作：“老辣文章见霸才”。

正因出名很晚，几十年寒灯苦学，其书法的气、韵、意、趣，达到了超凡脱俗、深邃隽永的境界。他视书法为性情中物，70岁时曾赋诗一首：“不随世俗任孤行，自喜年来笔墨真。写到灵魂最深处，不知有我更无人。”“写到灵魂最深处”是他追求书法至真至高的艺术写照。多年前，国内一位自认水平很高的书法家，经朋友引荐拜访林散之。他说：“写字不怕丑，只要抖三抖”，颤颤地写就一幅长条，请教林散之。林老看后不说话，只是用食指在抖得最厉害的一个字上直敲，敲得书案笃笃响。这位书法家问朋友这是何意？朋友说：“林老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到抖的时候，不能抖。”

林散之自幼学工笔人物画，后学山水画。拜师黄宾虹，是其艺术生涯的重大转折。他牢记黄宾虹“师古人，更要师造化”的教导，告别妻儿老母，孤身出游。历经苏、皖、鲁、陕、川等九省，游华山、峨眉山、庐山、三峡等名山大川，行程1.6万余里，历尽艰难险阻，得画稿800余幅。在游历名山大川中，林散之胸襟与眼界大开，尤对山川景色风云气象变化之灵韵深得感情，其书画渐入佳境。

林散之的“三痴”，是一种境界，其“痴”达到了物我两忘的程度。他在那里发现了自己的世界，一片可以让自己任意挥洒真性灵的世界。 □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吴有性“治温证千古一人”

“夫温疫之为病，非风、非寒、非暑、非湿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。其传有九，此治疫紧要关节。奈何自古迄今，从未有发明者。”这是明代吴有性结合行医案例写成、于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面世的《温疫论》中提及的，全书仅上下两卷、4万多字。

有关明代瘟疫暴发次数，学者们众说纷纭。邓拓《中国救荒史》记载发生疫灾64次，陈高佣《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》记载为69次，有学者统计为38次，也有学者统计为176次。统计结果虽未统一口径，但明朝疫情发生次数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，且具突发性和剧烈性，一旦暴发，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。《明史·五行志》记载的瘟疫，字字触目惊心，永乐六年（1408年）正月，江西建昌、抚州，福建建宁、邵武从上一月至这个月，因传染病而死的人有七万八千四百多人；永乐八年，登州宁海等州县从正月到六月，因传染病而死的有六千多人。福建邵武连年传染病大流行，全家死绝的有一万二千户；泰昌元年（1620年）十月，南京淮安疫，十人九病……

“昔仲景立《伤寒论》，盖为伤寒设也。嗣后论者，纷纷皆以伤寒为辞，其于温疫之证甚略。”吴有性创造性的洞见，冲破自远古以来所谓温疫皆因“鬼神作祟”“六淫”“伤寒”等所致的顽固堤坝。故而，吴有性被誉为“治温证千古一人”。

除医界之外，恐怕没多少人“认识”吴有性。《清史稿·列传》卷五百二说：“江南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的吴有性，字又可，生于明季，居太湖洞庭山。当崇祯辛巳岁，南北直隶、山东、浙江大疫，医以伤寒法治之，不效。有性推究病源，就所历验，著《温疫论》。”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点赞其功德也很“敷衍”：“有性推究病源，就所历验，著《温疫论》。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，又有变证、兼证、种种不同。并著论处方，一一辨别。古无瘟疫专书，自有性书出，始有发明。”

从苏州一些地方志和成书于崇祯十五年（1642

年）的《温疫论》中“发掘”才知，吴有性目睹崇祯十四、十五年连续两年大灾之后又大疫“死者阖门相枕藉，无遗类，偶触其气必死”的惨状，出于医者本性，在竭尽心力救死扶伤期间，他发现了很多疫病患者被误诊为伤寒而“治死”：“业医者，所记所诵，连篇累牍，俱系伤寒，及其临证，悉见温疫……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，未免指鹿为马矣。”

通过亲身实践，吴有性对古医书及当时临证“心疑胆怯”的医风提出质疑和批评。他不惧疫毒，主张“已知吉凶凶多，临证更须审慎”，治疗患者积极果断。在长期临证实践中，他观察到伤寒与温疫的区别，突破性地提出“戾气”致病疫学说，并指出瘟疫之邪由口鼻而入，使温病从伤寒体系中分离出来，成为温病病因学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。

吴有性提出了“邪伏膜原说”和“疫邪九传说”，对温疫的病因、发病、传变、治疗等均有创新性的见解：“此气之来，无论老少强弱，触之者即病。”他揭示了疫邪入侵的部位和传变特点：“温疫初起，先憎寒而后发热，日后再热而无憎寒也。初得之二三日，其脉不浮不沉而数，昼夜发热，日晡益甚，头身痛。”

他还指出：“牛瘟，羊瘟，鸡瘟，鸭瘟，岂当人疫而已哉……然牛病而羊不病，鸡病而鸭不病，人病而禽兽不病……究其所伤不同，因其气各异也。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疫病的流行性与散发性是“空气传染”和“接触传染”。据此，吴有性推论：“万物各有宜忌，宜者益而忌者损，损者制也，故万物各有所制。”这种类似于特殊之生物发生特殊之疾病的概念，比1762年奥地利帕伦息氏的“新发现”早了120年。

针对疫情症状，吴有性采取了科学的“疏利膜原”“分消表里”治则，并发明了“达原饮”“三消饮”等方剂，并深刻剖析了温疫与伤寒的相同点与区别。从他的字里行间中，不难看出在当时极为可贵的独立意识和科学精神。

□ 据《北京青年报》